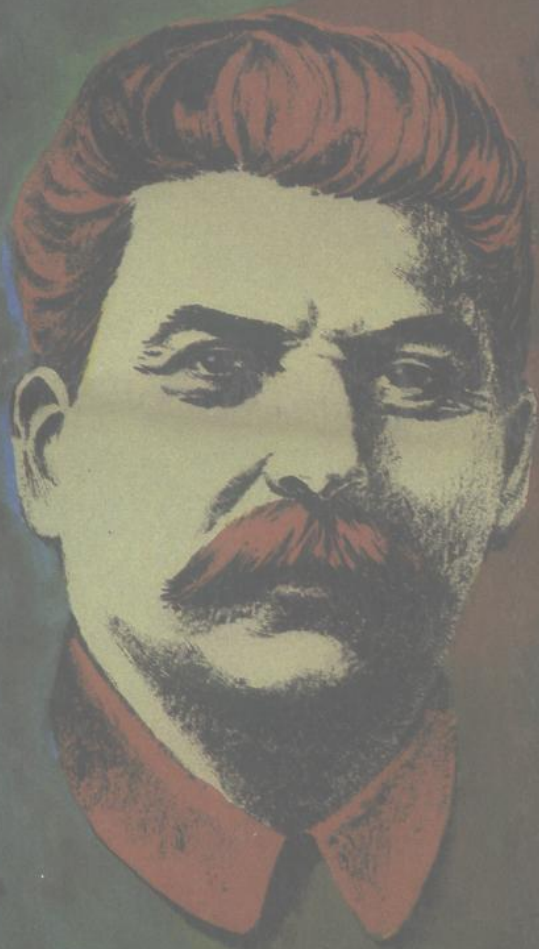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裴家勤 李毓榛 译

我这一代人的 眼 里 的

斯大林



我这一代人眼里的 斯大林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裴家勤 李毓榛 译

中国新闻出版社

К · СИМОНОВ
**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И·В·Сталине)
《Знамя》№. 3, 4, 5, 1988г.

责任编辑：邹小丹

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

[苏]康·西蒙诺夫 著
裴家勤 李毓榛 译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北京枫叶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0.75 字数257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7—80041—105—2/D·6

定价：3.60元

目 录

康·西蒙诺夫的最后—部作品

(俄文版前言) (1)

正文:

1979年2月23日 (1)

1979年2月27日 (25)

1979年3月2日 (59)

1979年3月3日 (72)

1979年3月4日 (80)

1979年3月5日 (93)

1979年3月6日 (99)

1979年3月7日 (107)

1979年3月9日 (129)

1979年3月10日 (144)

1979年3月16日 (154)

1979年3月17日 (161)

1979年3月23日 (172)

1979年3月25日 (180)

1979年3月26日 (186)

1979年3月27日 (193)

1979年3月30日 (197)

1979年3月31日 (214)

1979年4月2日 (221)

1979年4月4日 (232)

1979年4月7日 (242)

1979年4月8日	(249)
1979年4月9日	(255)
附录：第二部《斯大林与战争》(资料摘录)	(271)
1. 同苏联海军元帅伊·伊萨科夫的谈话	
2. 同苏联元帅亚·华西列夫斯基的谈话	
译后记	(326)

1979年2月23日

首先应当说明，我今天开始口授的这部作品不准备全文发表，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准备全文发表，我想把它全部交给国家档案馆，希望我这一代人当中之一所作的这种个人见证和思考，在某个时候将能引起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的兴趣。至于手稿的某些部分，我现在不排除将来我会愿意，并可能来得及自己看见它们发表。

到去年为止，斯大林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了，算到今天已将近26年，在这26年中，我记不起在哪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没有这样或那样地考虑斯大林的问题，考虑对他的活动和他这个人的评价，考虑他在我国历史上和几代人心理上的地位，或是直接考虑——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或是间接考虑——在与读者的通信、与各种各样的人就各种各样的题目谈话中，这些谈话总会这样或那样地提到斯大林以及关于他的争论。

由此可见斯大林这个人物的影响之大，无论在回顾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还是回忆我们的个人生活时——即使这一生活极其渺小，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简直就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避而不谈他。

我将作为我这一代人的成员之一来写斯大林。当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而不可动摇地成为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国家、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时，我们这代人是15岁，斯大林去世时，我们是38岁。今年，当他满100岁时，我

们将满64岁。

所谓我这一代人，我是指活到了64岁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1936—1938年的镇压中的减员虽然比我们的前辈要少得多，但我们在战争中却减员了一半，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所以，第一点说明是：所谓我这一代人是指比斯大林活得长的那一小部分人，而不是指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又在那个时代牺牲了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在牺牲时如果不是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就像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常常谈到的那样——至少绝大多数是喊着类似的、对斯大林的领导给以肯定评价的话，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在我即将写到的事情中，有许多东西他们是绝不会接受的——无论是在牺牲的前一年，前一天，还是前一小时。

说明二：在1915年出生的我这一代人中，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准确地讲，也许甚至是极少的，这些人由于公务和社会活动的关系曾多次非常近地接触过斯大林。因苏联作协的工作，我曾和现在已经作古的两个同事一起被斯大林接见过，接见长达几个小时；我曾和斯大林就我个人创作中的问题通过电话；我曾多次出席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的政治局会议，每次都要开好几个小时，包括我在内的作家也参加讨论。我不仅听过斯大林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最后一次讲话，而且听过大会闭幕后他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显然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讲话。后来，我又有幸在圆柱大厅呆了许多个小时，离得近近地看棺材里死去的斯大林，看从棺材边走过的人们。因此，这种直接得到的印象有一些被我记了下来，有一些则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它们在我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和活动时起过作用，并继续起着作用。

说明三：作为一个记者，一个40年来坚持不懈，几乎毫无例外地只写战争题材，首先是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家，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在这个或那个方面碰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起的作用问

题：我们失败的原因和胜利的根源问题、战争爆发的突然性程度以及我们备战或未备战的程度问题。通过三部曲《生者和死者》的写作和后来给自己战争年代的笔记作注释，我产生了强烈的想写“斯大林与战争”这个题目的念头。有些人对军事问题很在行，懂得什么是卫国战争，在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并因此而多次同斯大林打过交道，如果不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他们对斯大林的认识以及对这个人——首先是对一个战争前研究过军事问题、战争中成了最高统帅的人——的看法，那么我就不认为自己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中有权写斯大林直接出场的那几章。

在写《军人不是天生的》这部小说的几年中，我就这些问题同一些懂行的军人谈过话，谈话后记下了他们的回忆、他们的意见，作为补充，有时也记下了我自己脑子里产生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写完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之后，再给自己的笔记《战争时期的不同日子》作注释的断断续续的10年中我还继续在做这件事。战争时期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事件无论发生的原因还是带来的后果都是和斯大林个人，和他领导战争的性格分不开的。我在给战争笔记作注释时碰到一系列问题，为了对这些问题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我必须竭尽所能地广泛了解军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对这些不同时代的人，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说明，但用所有听来和比较得来的东西作结论的却是我自己，是我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不言而喻，对我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由我自己负责。

最后是第四点说明：从我开始发表三部曲《生者与死者》直到今天的20年中，无论我接到多少读者来信——这些战争小说的读者来信每三封中就有一封，至少每四封中就有一封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这样或那样地谈到斯大林与战争的问题。许多信我都回

了，有些信我同意，有些我不同意，但不管怎么样，20年来我总在以各种方式同一股从未停息的信息洪流打交道，这信息就是：各种各样（各种社会地位、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的人如何看待斯大林与战争这个问题。我的书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他们发表意见的借口，但仅仅是借口，而不是引起思考的原因。引起思考的原因是我国社会在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现实。20年从未中断的总是谈论这个问题的信息洪流影响了、并且还在继续影响我——这并不奇怪，要不是这样才奇怪呢——这一点在我此刻正着手写的这部书中也将反映出来。

鉴于我在以上四点说明中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原因，本书的内容可能一方面很狭窄，一方面又正相反，比它的名称《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所包括的内容更宽广。

回顾遥远的过去，回顾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最难以对付的是总想把自己今天的思想混杂在当时的思想中，从而显得自己更有远见，对时代的打击更敏感，对所发生的事更有批判力——简而言之，比实际中的自己更聪明。我将竭尽全力摆脱这种思想的诱惑。少年时代的我看来并不是傻瓜，可是，我却回忆不起值得写上一笔的自己在那些年月对斯大林的思考。我几乎记不起有我在场时家里谈论过什么政治问题。模模糊糊地记得我的继父在梁赞步兵学校当战术教员那段时期，家里对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的活动有些不满。记得我们都不喜欢他。我想这与他对待在红军中服务的军事专家的态度有关——我的继父就是这些专家之一。记得当伏龙芝取代了托洛茨基的位置时，大家的反映是好的，后来伏龙芝去世时，家里人都很难过。大家既吃惊又不满地看待伏罗希洛夫对他的接替，看来，在像我继父这样的人当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任命比伏罗希洛夫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

人来接替伏龙芝死后空出来的职位。指的是谁，我不知道，但在家庭谈话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看法。

家里对列宁逝世的反应是强烈、深刻而悲痛的。反应强烈可能还因为那年我们住在莫斯科，继父正在高等军事师范专修班进修，作为这个军事学校的进修生，他在列宁的治丧期间参加了站岗。记得家里的人都哭了。至于由斯大林接了列宁的班，这一点无论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或是家里的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大家不喜欢托洛茨基，关于同他的追随者——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大家听说过，都知道，何况这个斗争也在军队里进行过，其反映就更直接地为继父所了解。大家对托洛茨基分子是持否定态度的，把同他们的斗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根据我的记忆，当时并没有把斯大林看作是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主要战士。到1928年，甚至到1929年，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契切林^①、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名字在某些场合还是并列的。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字前几年也是如此，后来就从公开场合消失了。任何事情都是斯大林领导的，这一概念是在农业集体化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某个时候形成的，十六大召开时我正在中学上七年级，当时叫第七班。

对许多年之后被称作“没有根据的大规模镇压年代”的那种残酷的现实，我很早就感受过，那是1927年，我才12岁，当时还没有那种大规模的镇压。记得那时我同母亲、表姐正在克列缅丘格市郊区波托基村继父的表姊妹家作客。继父的表姊妹姓卡缅斯卡娅，我称她热尼娅表姑，父称我记不得了。热尼娅表姑是个善

^① 格·契切林（1872—1936）——苏联老革命家，1918—1930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良而精力充沛的人，非常讲求实际，同时又很高尚——就像后来她的遭遇所表明的那样。她住在波托基村一所不大的房屋里，陪伴着已病入膏肓的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杰夫。列别杰夫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退伍的前沙皇军队的中将，由于双腿瘫痪，已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多年，热尼娅却一直照料着他。热尼娅已不年轻，但毕竟比他年轻许多岁，显然，当她同意以不像是妻子，倒像是陪伴护士的身份守着他这个瘫痪病人时，曾有过自己的一些实际想法。然而，当一切突然发生，情况急剧变化时，她没有抛弃可怜的老人，而是继续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看来，老人属于那种自由派的俄国军官，他坚毅而自尊地忍受着瘫痪的痛苦，既不诅咒命运，也不埋怨苏维埃政权。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我这个12岁的孩子很喜欢听他讲话，不管他讲的是什么。这我记得很清楚，虽然他讲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

一天，我同母亲、表姐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就像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一刻钟之后突然发现什么东西落在家里了——不知是母亲的头巾或短上衣，还是别的什么。不用说，便派我回去取，因为我最小。我跑回去敲门时，开门的不是热尼娅表姑，而是一个陌生男人，他让我进屋后，又把门关上了。屋里还有一个陌生人，当我进屋时，见他正微微掀起列别杰夫两只瘫痪的腿下垫的褥子，往褥子和弹簧床垫之间的夹缝里看了看，不知是在寻找什么，还是想把什么弄整齐——这我没有弄清，只明白了一点，那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不寻常的事。尽管已经明白了，却仍然不自觉地问站在床边的热尼娅表姑，我母亲忘记带的那个东西在哪儿，说我需要把它找到，再跑回去。可是，没等她回答，放我进屋的那个人就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你先坐下吧，孩子，坐这儿等一等。”我回答了两句，意思是，母亲正等着我呢，“你母亲不会等你，她会上来这儿来找你。坐下吧。”他又指指椅子，

态度虽不粗暴，却很威严，足以使我明白不能不坐下，于是便坐下了。又过了几分钟之后，才完全明白所发生的事，因为正在说话的列别杰夫见我进屋后，停住不说了（我还在门外就听见他在大声讲着什么），现在见把我留了下来，便不再顾虑我在场，又继续往下说。原来这两个穿便服的人是来搜查他的住处的，虽然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却没有出示搜查证，于是他便骂他们擅入民宅，威胁说要控告他们，还说了一些羞辱他们的话，非常激动。热尼娅姑姑似乎对搜查毫不在意，她最担心的是列别杰夫会因激动而晕厥过去，于是便尽力安慰他，却无济于事。前来搜查的人继续干着自己的事，把放在书架上、桌子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还把桌布和书架上的绣花垫布掀开看看。靠着墙半躺在床上的列别杰夫继续骂他们，我则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

一小时之后，因我没回去而感到不安的母亲让表姐来找我。她也被强迫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后来母亲也来了，让她坐在了第三把椅子上。搜查终于结束，搜查者确确实实是毫无所获地走了。他们很克制，对列别杰夫的辱骂没有还口，可能因为看到他又老又是个瘫子。不过，所有这一切仍然给我留下了一种久久难以忘记的不愉快印象。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滥用权力。列别杰夫说话算数，真写了封控告信寄去，但是否有结果，我就知道了。不错，这以后便没有人再去打扰他，几年后他也就死在了那个波托基村——我们是从信里知道的，因为打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那儿。

这件事我是按照它留在童年时代记忆里的模样来写的，我想没有夸大。在我的记忆里我并不是碰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或者可悲的事，或者使我大为震动的事。当时我感到的只是吃惊：我突然碰上的这件事，好像与我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协调……

一年后，我们在萨拉托夫^①时（这之前继父已在那儿的一所后备军事干部进修学校工作）得到一个消息：继父的一个远亲被流放去索洛夫基了。这是一个所谓八竿子够不着的远亲，不知是他的内弟^②的姊妹的丈夫还是别的什么关系，这方面我总是弄不清。继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不喜欢，甚至瞧不起这位远亲。继父自己作为战斗部队的一个军官曾五次负伤，中过毒气，因勇敢作战而多次受奖，所以他不能原谅那个远亲（也是个军官）耍滑头不上前线，整个战争时期都在某军需部门度过这一行径，因此称他为“面粉骑兵”。“面粉骑兵”的意思是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至少在我们家庭的概念里是如此。不过，根据我所记得的当时的那些谈话，他被流放去索洛夫基不仅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他参加了一起非法买卖外币活动，与他同案被关起来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一些更重要的人物。对这件事，继父的态度一如他的性格：冷淡，不妥协。对被流放者的妻子——一个妇女，他表示同情，但对被流放者本人，继父的评语是罪有应得。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意思是这样。

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我们学校成立了学习五年计划两种方案（基本方案和最佳方案）的小组，我对这件事的兴趣比对学校里的功课的兴趣要大得多。在离萨拉托夫不远的伏尔加河畔，正在修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萨拉托夫市也在修建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并同时迅速地建成一座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生产拖拉机零件的小工厂——这一切情况合在一起便起了它的作用：尽管继父反对（我要迈过这一关不是那么容易的），母亲中立，我在念完七年级以后仍然和同年级的半数同

① 苏联萨拉托夫州的首府。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继父前妻之弟。

学一起，进了技工学校。

是按照中央劳动研究所规定的办法招考我们的，先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测验，根据测验的结果确定了我们未来的专业。命运让我当上了车工，于是从1930年秋天起，我便开始在第二机械学校学习车工技术，几个月之后便以学徒工身份在技校旁边的一个小工厂里开始实习，这个工厂的名字叫“万能”，是生产车床用美式卡盘的。一些同学和我在一起实习，另一些在其它工厂实习——“革命的发动机”锅炉厂和拖拉机配件厂。我学车工专业很吃力，我的两只手一点也不灵巧。还有一种额外的困难，那就是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孤儿院来的孩子，而我们这些“从家里来的”孩子则比较少。我们的理论课比他们学得好算不了英雄，而实际操作要是不如他们，对我这个“从家里来的”孩子来说就意味着我属于那种被人蔑视的小少爷，我可是不愿意当小少爷，所以便竭尽全力地干。

技工学校的培训班当时是两年制，所以1931年春天我已面临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远景——升入二年级，开始拿二级，而不再是一级车工的工资，工资几乎要增加一倍。这对于捉襟见肘，没有任何余钱的我的家庭经济来讲，是有着实际意义的。力求在生产实习中不出问题，争取拿二级工资，还与我想弥合与继父之间长期的互不理解有关。虽然我没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他既然同我母亲结了婚，就要把我的教育问题负责到底，要我读完九年制中学，读完大学，当上工程师。他的希望就是这个，并仅仅是这个，之所以如此可能还因为他自己年轻时读完实科中学后本想受到高等技术教育，但未能如愿。由于没钱继续念书，他这个当初根本不想当军人的人便上了士官学校。总之，当我进技校之后，几乎整整一年他除了“你好”和“再见”之外什么话也不跟我说。他既不能容忍我对他的违拗，也不能同意我的决定。虽然

他心里爱我，我也同样爱他。

我们家，在军人宿舍一个带合用厨房的套间里，住着两间相连的屋子，在套间的另外两间屋子里还住着两对夫妇，也是军人。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睡了，屋里已灭了灯，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总是10点钟早早就睡了。突然有人敲门。当时母亲正病着，有些发烧。继父去开门。我睡在外屋的衣柜后面，听见说话声也醒了。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在我们家里发生，但还是发生了——搜查。我开了灯，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和匆忙穿好衣服的继父。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继父直到把衣服全都穿好后才去开门，并且对门外的人说：“我不穿好衣服是不会来开门的。”果然穿得整整齐齐——靴子、马裤、军便服外面系着皮腰带，和平时完全一样。也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说敲门声持续了很久，因为外面的人不愿等继父穿好衣服，可是我的觉睡得太死，没有马上醒来。当我跳下床时，见继父戴上眼镜后又拿起一个放大镜（他的眼睛被毒气弄伤后视力很差，所以常常既用眼镜又用放大镜）站在那儿读一份文件——搜查证，读完后还给了陌生人。他很镇静。母亲也一样，她已穿上长衫，站在里屋的房门口。

“你睡觉去，”继父严厉地对母亲说，就像平时同她说话一样，“这儿没你的事。你有病，睡觉去。”

但母亲怎么也不去睡觉，只是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一直坐了好几个小时。

搜查持续了很久，非常认真和仔细，把两间屋的所有地方都搜查了，甚至检查了我在技校的金属工艺学笔记本，过去上中学七年级时的笔记本，还有母亲保存的那无数的信件。她喜欢写信，也喜欢所有的亲戚朋友给她写信。我记得不一定准确，这事大约发生在4月的某一天，当时天亮的时间还不那么早，可是搜

查结束时，天已经完全亮了，就是说，搜查至少持续了6个小时，甚至更多。

当搜查完毕，他们拿起一包纸和信，好像还开了一张被带走物品的清单（也可能我记错了），准备离去时，我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谁知其中一个人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让继父看。这已经不是搜查证，而是逮捕证。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才明白，不管搜查的结果如何，逮捕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下来了。母亲的脸色很难看，虽然她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妇女，但由于她有病，又在椅子上发着烧坐了一个通宵，她全身都在发抖。继父则很镇静，他从军便服的胸兜里掏出放大镜——又要用放大镜——把那张纸仔细看了一遍，确信这的确是逮捕证后，便轻轻吻了一下母亲，告诉她，一旦把所发生的误会弄清楚了，他马上就回来。他默默地，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便同逮捕他的人一起走了。

我同母亲留在屋子里。她还在发抖，她不愿表现出自己的软弱，也不喜欢别人这样，所以为自己的颤抖抑制不了而感到可耻。后来她在床上躺下来，看了看表，对我说：“你自己热点粥和咖啡喝吧，马上你就该去技校了，别迟到。”我说我不去了，要留下来陪她，可她说我必须去，而且必须立刻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技校，否则就是胆小鬼。

误会并没有弄清楚，那天没有弄清楚，一周后，一个月后也没有弄清楚。我在技校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大家，仍继续在那儿学习和工作。大家对我的态度一如过去，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在交我的入团申请书时（恰好那几天我已经和团组织谈好，准备交入团申请），他们让我先等等，等继父恢复自由以后再交。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委婉的讲法，可当时我觉得他们只能这样讲。我绝对相信这件事是误会，继父一定会回来，虽

然知道审判工业党^①之后我们萨拉托夫市逮捕了好些老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旧人员”，记得其中还包括一个在我继父那个军事学校工作的旧军官。但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别的某个人可能被逮捕，别的某个人可能和工业党成员一样有罪，但我继父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只能是误会。

如果说，在我学习的技工学校人们对我家里发生的事并不在意，对我态度很好，那么在我继父任教并在那儿备受尊敬的军事学校里，一切则正相反。我认为，无论当时和随后的情况多么严峻甚至残酷，就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很多事，至少是某些事，仍然取决于直接决定这些问题的人。军事学校的校长和政委却下令立即将被捕营长阿·伊万尼舍夫^②的家属从所住的公房里赶走。第二天我从技工学校回来时，母亲说已让她看了他们两人签署的命令，要她在明天到来之前把房子腾出来。母亲怒气冲冲地要去找他们，被邻居劝住了。如果她不是还在发病，很可能劝不住，病妨碍了她。

第二天早上一个军官（可能是低级军官，记不清了）带着几个红军士兵来到我家。两间屋子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搬走，于是我们被告知，或者我们自己搬走，或者他们给扔出去，屋子要查封。邻居们帮了忙：能搬到他们家的就放到他们家，放在前室的墙边，对那些放不进前室的，妨碍过路的，只有一个办法：往院子里搬。于是母亲挥挥手，让搬到院子里去。幸好我们的东西不多：一张餐桌、几把椅子、两个书架、两个衣柜、一张床和一张

① 2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运动从1928年所谓技术专家破坏矿井的“沙赫特事件”开始，大批逮捕知识分子，说他们组织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地下“工业党”。1930年底进行了对“工业党”的审判，许多知识分子被判刑和流放。

② 西蒙诺夫的继父的姓名。